

英国区域研究史及若干思考

——基于对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考察

王昭晖

内容提要 英国区域研究发展史具有独特参考价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作为20世纪以来英国区域研究最为重要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先后经历创生、发展、扩张、收缩和调整几个不同时期。亚非学院自创生之始就与英国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相连,其发展在政府部门、大学机构和学术组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中形成合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对区域研究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亚非学院随之快速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起,亚非学院强调社会科学 with 区域研究的融合,但是从未放弃对语言教学和古典研究的重视。亚非学院如今不仅具有区域院系,语言基础扎实,与学科院系合作紧密,而且具有区域研究中心,提供多学科和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以亚非学院为代表的英国区域研究可以为中国构建区域国别学提供若干有益启示。

关键词 区域国别学 英国 区域研究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 王昭晖: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邮编:361005)

** 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项目编号:21JZD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任晓教授对本文的写作建议,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观点及错漏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区域研究在美国迅速兴起,美国构建了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完备的区域研究体系,成为区域研究的世界性范本。由于美国区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学术界对于美国区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着较好把握,但对于欧洲区域研究的掌握情况则存在一定不足。^① 美国是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的国家,美国区域研究在世界上占据独特而庞大的地位,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所处的国际格局以及美国特殊的学术和社会生态紧密相连的。^② 如此,比较视野下的区域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以防止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将美国区域研究作为不假思索进行仿照的模板。其实,伴随着航海大发现以来的全球化与殖民扩张,欧洲东方研究作为区域研究的先行者,早在18和19世纪就开始关注非西方世界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欧洲高等教育体系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建制化发展,随后经历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区域研究相当不同的发展历程,这是本文的核心关切之一。

在这方面,笔者认为,英国区域研究发展史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其一,大英帝国曾经是历史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帝国,英伦三岛能够管辖如此广泛的领土并留下可圈可点的遗产,而且至今英联邦国家也仍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各种重要作用,可见英国具有独特的统治术,其不仅需要英国政治家独特的领导艺术,而且需要英国学术界(特别是区域研究)强大的智识支持;^③其二,英国在欧美世界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在更长时间范围内进行英国与欧陆国家、英国与美国的各种横向比较变得切实可行且富有意义。在本文讨论中“区域研究”的含义甚为宽广,对现代西方域外知识体系而言,包括以欧洲为代表的

^① 关于美国区域研究,参见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61页;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9—40页;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0—160页。欧洲区域研究以东南亚研究为例,参见何肇发:《英国对东南亚历史的研究》,《世界历史》1980年第4期,第74—77页;刘永焯:《法国对东南亚的研究》,《东南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第105—111页;大刚:《英国东南亚教学简介》,《东南亚》1986年第1期,第55—58页;贺圣达:《参加英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七届年会观感》,《东南亚》1987年第3期,第58—59页;李延凌:《在英国参加东南亚研究学术会议综述》,《印度支那》1988年第4期,第60—62页;林子:《第三届欧洲东南亚研究大会》,《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21—122页;包茂红:《国际东南亚研究的演变:以东南亚史研究为重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96—108页。

^② 牛可:《区域研究、学科体系与大学组织》,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222—231页。

^③ 钱乘旦主编:《英帝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其中,东方研究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和殖民主义扩张密不可分,而区域研究的发展则以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与美苏争霸作为时代背景。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一般把域外研究称为“区域国别研究”或“国别和区域研究”,但由于时空背景和研究目的迥异,因此与西方的“区域研究”有所区别。^①

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简称亚非学院,是目前英国唯一一所专门致力于亚洲、非洲与中东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在区域研究领域享负盛名。笔者基于《亚非学院学报》、亚非院校史书籍,以及亚非学院教职发表的关于亚非学院的文章和著作等文献资料,通过对亚非学院的历史考察,主要梳理20世纪以来的英国区域研究发展史,并适当以美国和欧陆国家为参照,探讨其对中国构建区域国别学的启示。^②

一、英国的亚非学院创生史

亚非学院成立于1916年,时称东方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于次年1月18日招收第一批学生入学,并于2月23日由英国国王乔治五

^① 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第134—160页。

^② 《亚非学院学报》参见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bulletin-of-the-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 2023-01-13。亚非院校史书籍参见 Cyril H. Phillips,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17-1967: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1967; David Arnold and Christopher Shackle, eds., *SOAS Since the Sixtie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2003;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Catrine Clay and Hugh Baker, eds., *SOAS: A Celebration in Many Voices*, London: Third Millennium, 2007。亚非学院教职相关文献参见 Ralph L. Turner,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Great Britain,”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19, No.6, 1948, pp. 284-287; Alan Lodge,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Wilfred L. Saunders, ed.,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Library Studie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68, pp. 84-110; Victor L. Ménage,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1, No.1, 1974, pp. 7-9; Rosemary Stevens, “Acquisition of Serials from Asia and Africa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Library,” *Library Acquisitions: Practice & Theory*, Vol.7, No.1, 1983, pp. 59-70; Michael McWilliam, “Knowledge and Power: Reflections on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Study of Asia,” *Asian Affairs*, Vol.26, No.1, 1995, pp. 33-46; Michael Hutt, “Area Studi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Somewheres’,”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27, No.1, 2019, pp. 21-25。

世正式为东方学院揭幕。然而,1916年绝非亚非学院或者英国区域研究的起点,如亚非学院的奠基人菲利普·哈托格(Philip J. Hartog)在《亚非学院学报》创刊号中所说,“我们的历史比它应该有的要长得多。”^①如下文所详述,英国东方研究颇有历史传统,亚非学院亦经历了漫长的创生史,说明英国区域研究的早期发展与美国路径是截然不同的,值得仔细剖析和分辨。

首先,虽然19世纪是东方研究在欧洲高等教育体系建制化发展的开端,但英国最为古老的两所高等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16世纪便开始对近东及远东的语言、文学、历史和宗教等进行教学与研究,因此,东方研究是20世纪以前英国区域研究最为重要的学术渊源。以牛津大学为例,牛津大学于1546年设立希伯来文教席,1636年设立阿拉伯文教席,1832年设立梵文教席,1869年设立汉文教席,1871年成立东方研究荣誉委员会(Board of Studies for the Honour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894年成立东方语言学院(Faculty of Oriental Languages),1914年改名为东方语言文学学院(Faculty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②可见,牛津大学的东方研究涵盖广阔的地域范围和时间范围,对从古至今有文字记载的非西方文明(即“东方”)进行整体性研究。当然,19世纪东方研究在欧洲的建制化发展,是与欧洲国家的“帝国事业”紧密相连的。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主义扩张在19世纪达到顶峰,殖民地政府和跨国公司(如英国、法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随之参与到东方研究的知识生产中,成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定义的“东方主义”话语和实践的典型代表,本质上形成福柯意义上欧洲对于东方的系统规训和统治。^③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瑟夫·博登(Joseph Boden)上校资助牛津大学设立博登梵文教席(Boden Professorship of Sanskrit),并为研习梵文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旨在帮助英属印度人民皈依基督教。同时,英国殖民地官员常常同时兼具书写东方的专家学者身份,例如,曾任埃及总领事(1883—1907年)的伊夫林·克罗默(Evelyn Baring Cromer)著有《现代埃及》

^① Philip J. Hartog, “The Origins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17, Vol.1, No.1, p. 22.

^② 东方语言文学学院于1936年改名为东方研究院(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2022年改名为如今的亚洲与中东研究院(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参见牛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介绍:University of Oxford 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History of the Faculty,” <https://orinst.web.ox.ac.uk/history-faculty-1>, 2023-01-13.

^③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p. 1-3.

(*Modern Egypt*)和《古代和现代帝国主义》(*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曾任印度总督(1898—1905年)的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著有《在印度边境》(*On the Indian Frontier*)、《波斯和波斯问题》(*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和《远东问题》(*Problems of the Far East*)等,且二人均在日后亚非学院的创办中扮演重要角色。^①

其次,亚非学院的创生,应当追溯到伦敦最早的两所大学——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和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对于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伦敦大学学院于1826年创立之初就设立了希伯来文、印度斯坦文和东方文学教席,并于1831年和1836年分别增设梵文和汉文教席;伦敦国王学院于1829年创立之初就开始提供东方语言文学的课程,并在后来陆续设立亚非各种语言的教席。随着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迅速向外扩张,英国各界对于东方语言培训和文化了解的需求不断增加,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大学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考虑进行更有效的跨校合作,一方面是避免重复语言教学,另一方面是加深细化东方研究,于1890年共同创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School of Modern Oriental Languages),可谓是东方研究学院的前身。^②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它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也没有获得独立的办公楼和图书馆,最后于1902年关停,其中,最大原因在于现代东方语言学院没有获得更高层级组织机构(包括英国政府和伦敦大学)的有力支持。

再次,横向比较来看,在19—20世纪之交英国虽然有着更广阔的殖民地和更广泛的区域事务(包括帝国管理、军事安全和商业往来),但英国区域研究的建制化水平相比于欧陆国家(法国、德国和俄国)是相对落后的。以法国为例,法国政府早在1795年就颁令设立东方语言专校(*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于1838年将其纳入法国高等教育体系,1869年确立其语言教学与区域研究并重的使命,于1914年改名为东方语言学院(*Langues O'*),进而于1971年改名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成为法国区域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高等教育和科研

^①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pp. 212-216.

^② Cyril H. Phillips,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17-1967: An Introduction*, p. 10.

机构。遵循欧洲东方研究传统,其校名中的“东方”并非仅指地理概念上的亚洲,而是指法国身处的欧洲文明以外的文明圈,包括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意味着法国知识精英所致力于理解的外部世界。目前,该学院教授超过百种语言和文化,研究范围涉及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多学科,是区域研究领域内法国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宏大的学术机构,在世界上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①

在这种背景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虽无疾而终,但在伦敦设立一所专门致力于东方语言和研究的呼声和努力却未曾中断。1904年,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院士、伦敦大学学院托马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教授发布《英格兰和海外的东方研究》并引起反响,他系统比较了英国、法国、荷兰和德国在东方研究领域的机构设置和教职数量,指出英国现有的东方研究与大英帝国的利益关切不相匹配,且严重落后于德国,这在20世纪之交英德竞争的背景下尤为堪忧。^② 1905年,伦敦大学评议会(Senate)成立一个高层级的委员会,由阿奇博尔德·罗斯伯里(Archibald Philip Primrose Rosebery)校长和爱德华·巴斯克(Edward Henry Busk)副校长领衔,聘请哈托格作为秘书长,考虑伦敦大学重组东方研究的方案,并邀请包括英国国家学术院、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非洲协会(African Society)等机构的有识之士进行探讨。伦敦大学评议会最终批准了这一建议,于1906年底送呈英国首相。时任英国首相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认可英国国家学术院和伦敦大学关于英国东方研究落后于人且需重组加强的意见,并敦促相关部门采取行动,次年英国财政部任命唐纳德·雷伊(Donald James Mackay Reay)组织专门委员会,研究创立东方研究学院。雷伊曾任孟买行政长官(1885—1890年)、印度事务大臣副手(1894—1895年)、英国国家学术院主席(1902—1907年)和皇家亚洲学会主席(1893—1921年),在政界和学界均有相当的影响力。雷伊委员会于1909年发布专门报告,详细论证东方研究学院的语言教学、教职设置、学生规模、办公楼选址和办学经费等

^① 参见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介绍:Inalco University, <http://www.inalco.fr/en/inalco-university>, 2023-01-13。

^② 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 "Oriental Studies in England and Abroad," in *British Academ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03-190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4, pp. 183-197.

问题。^① 基于雷伊委员会的报告,英国政府进一步于1910年组建克罗默委员会,由前文所提及的克罗默和寇松共同领衔,两人均位高权重,且仍聘请哈托格,对东方研究学院的创立做出了实质性的推进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伦敦大学的委员会,还是雷伊委员会,抑或是克罗默委员会,哈托格作为奠基人都强调东方研究学院虽然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治理和商业需要,但却不能仅限于语言教学培训和政府资政服务,东方研究学院要对亚洲和非洲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和社会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与柏林、圣彼得堡与巴黎的东方研究机构是相一致的,英国人不愿也不会低人一等。^② 总而言之,东方研究学院设立之初本质上是为大英帝国服务的,主要提供亚非语言教学培训,辅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区域研究,以满足英国实现帝国管理、军事安全和商业往来的人才需要。^③

亚非学院的前身东方研究学院在20世纪之交经历了漫长的创生史,并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最终到1916年才正式成立。考虑到大英帝国日益增长的海外需求,亚非学院的诞生可谓“深思熟虑却拖延太久”。^④ 原因在于,亚非学院的创生并不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而且依赖诸多自下而上的协商和协作,政府部门、大学机构和学术组织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中形成合力,虽然推进速度较为缓慢,但却符合英国人渐进主义、稳中求进的行事风格。回顾亚非学院创生史,结合美国区域研究创生史,可以发现,英国区域研究与美国区域研究的发展路径是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是在国家发展到国力鼎盛随之面临国际竞争的国际背景下展开,但是,英国(以及欧陆国家)的区域研究一方面更多地依靠政府支持,另一方面对于语言教学研究的重视使得其从未与欧洲东方研究的人文传统相割裂,相反,在美国,由于是社会科学理事会的(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主导下的区域研究创生运动,而且财力雄厚的大基金会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因此,

① Treasury Committee on the Organis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s Commissioners of His Majesty's Treasury to Consider the Organisa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in London*,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09.

② Philip J. Hartog, "The Origins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pp. 5-22.

③ Cyril H. Phillips,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17-1967: An Introduction*, p. 17.

④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p. 7.

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发展路径,这在亚非学院的后续发展中还可以看得更为清楚。^①

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区域研究的缓慢发展

东方研究学院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中走来,然而,英国的衰落正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英国虽然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付出沉重代价,英国从战前的债权国变为战后的债务国,战后英国经济长期低迷,国际金融中心也由英国伦敦转移到了美国纽约,这也使得英国越来越难以承担维系一个帝国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和军事支出,“日不落帝国”开始变得名存实亡。在此背景下,英国区域研究难以获得社会各界精英的关注和支持,东方研究学院难以获得显著发展,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财政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时间里,东方研究学院都缺乏充足和稳定的资金来源,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更是出现大量的财政赤字,在这种状况下东方研究学院的办学发展可谓艰难而缓慢。

首先,东方研究学院为了缓解财政困难,提供了大量的短期语言培训课程,这固然使得东方研究学院成为训练英国使节、派驻殖民地官员、派外情报员、海外商业人士和传教士的重要机构,但这类短期语言培训常常仅有几周,这其实与高等教育体系所提供的语言教学和研究是不相称的。例如,东方研究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每年的招生规模大概在500人上下,其中,为了获取学位的全日制学生比例只有略超过10%,但传教士学生的规模却达到20%左右。^② 虽然如此,东方研究学院提供的语言教学种类却是相当丰富的,在1919—1920学年提供32种语言教学,其中,招生数量最多的包括阿拉伯语、印度语、汉语和日语等,在1935—1936学年则增加到39种语言教学,在这个过程中东方研究学院积累了大类的语言教学资料,包括介绍读本、留声唱片、语法

^① Ke Niu, "The SSRC and the Founding Movement of Area Studies in America, 1943-1953,"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1, No.2, 2019, pp. 283-309.

^② Cyril H. Phillips,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17-1967: An Introduction*, p. 20.

指南、经典选读和语言史等,为英国区域研究的语言教学打下了坚实基础。^①

其次,东方研究学院慢慢培养起一支专门致力于语言教学和区域研究的学术队伍。在学院创立之初,其教职人员大多来自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在1919—1920学年,亚非学院拥有专任教职28人;1929—1930学年,这一数目增加到38人;到1934—1935学年,其教职人数达到43人。^②因为财政制约,东方研究学院的教职数目增长相对缓慢,但由于东方研究学院与英国政府所形成的紧密联系,不少重要的教职人员都来自英国政府派驻殖民地官员。例如,雷金纳德·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驻中国超过30年,曾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之外籍帝师,被聘为汉文教授;理查德·温斯特德(Richard Winstedt)曾驻马来亚联邦超过30年,被聘为马来文讲师,后来晋升为准教授(Reader)和荣誉院士(Honorary Fellow);约翰·斯图尔特(John Alexander Stewart)曾驻缅甸将近20年,被聘为缅文讲师,后来晋升为准教授和教授。^③当然,东方研究学院也有通过科班训练、学术路径晋升的教职人员,此处不一一赘述。东方研究学院的教职数量虽然没有急剧扩张,但这一阶段其语言教学和区域研究的基础扎实且富有特色,形成了一批奠定英国区域研究基础的代表人物和作品。

再次,东方研究学院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有两个重要的行政改革。其一,东方研究学院于1932年决定重组全校的教学科研机构,形成八个系,其中六个系致力于区域语言和文化,包括古印度与伊朗系、现代印度与锡兰系、东南亚与群岛系、远东系、近东系和非洲系,另外两个系则偏重学科,致力于东方历史与法律、语音学与语言学;^④其二,1938年,东方研究学院决定在校名中加入非洲研究,正式命名为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并延续至今。虽然非洲研究在东方研究学院创立以来就占据一席之地,但改名后的亚非学院可以更好地与非洲殖民地政府打交道,获得包括来自尼日利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尼亚萨兰和索马里兰等殖民地政府的不少捐款,成为亚非学院在后来第

^①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p. 53.

^② Ibid., p. 56.

^③ Ibid., pp. 60-61.

^④ 东方研究学院于1936年进一步削减系的数量,古印度与伊朗系和东南亚与群岛系被并入其他系中,后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重新恢复。Cyril H. Phillips,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17-1967: An Introduction*, p. 23.

二次世界大战中延续教学和研究的的重要资金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亚非学院的日常教学和科研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随着1941年开始英国在亚洲与日本交战,亚非学院也全力为英军提供战时后勤支持。其一,亚非学院尽可能快速有效地为英军培训和输送语言人才。例如,1940—1941学年亚非学院为英军培训了163名学生,1942—1943学年这一数目增长到310名,1944—1945年则达到567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亚非学院进修的英军学生数量总共不低于1674人,远远超过了其他学生数量之和;^①其二,亚非学院师生承担了大量战时外文情报和通讯的审阅和翻译工作。虽艰苦卓绝,但亚非学院可谓战功彪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和军队才深刻意识到了亚非学院教学和研究的的重要性,一方面是战时相关人才的严重短缺,另一方面是战后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使得英国海外殖民地管理面临巨大挑战,这些都使得亚非学院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为亚非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发展埋下了伏笔。

通过回顾亚非学院/东方研究学院在两战期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区域研究由于成本更大、条件更高,不得不高度依赖大学之外的组织机构(国家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政策或资金支持。对英国来说,亚非学院从创立之时就与大英帝国密不可分,亚非学院的艰难发展也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相对衰弱的国势决定的。对美国来说,区域研究的发展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处的国际格局和时代背景有关,并较多地依靠大型公益基金会和权威学术组织来实现。因此,英美区域研究的发展,虽是时势使然,但却路径相异。

三、英国区域研究的快速发展和扩张

由于亚非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后英国政府对区域研究的重视程度大大加强,亚非学院也抓住机遇,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时间大概从1946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其标志是1946年起草并于1947

^①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Report of the Governing Body,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Departmental Reports for the Year Ending 31st July, 1945*, p. 24;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Report of the Governing Body,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Departmental Reports for the Year Ending 31st July, 1946*, p. 21.

年公开发布的《斯卡伯勒报告》(Scarborough Report)。《斯卡伯勒报告》是一份政府报告,由劳伦斯·斯卡伯勒(Lawrence Roger Lumley Scarborough)主持,由英国外交部牵头组成跨部门报告委员会(包括诸如殖民部、国防部、空军部、陆军部、教育部和海外贸易部等部门代表),针对英国区域研究的教学和研究状况进行调查,并通过跨国横向比较,向英国政府提出加强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的对策建议。^①《斯卡伯勒报告》提出,英国现有的研究机构和力量无法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全球战略需要,特别强调应该大力支持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区域研究,通过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以专项基金方式支持区域国别的教学与研究。

具体而言,《斯卡伯勒报告》强调区域研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院系建制,应该以“强大的系的形式而非孤立教职的形式”存在,而且这些区域院系应该独立于本科生招生需求,并拥有自主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这样才能保证区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②另外,《斯卡伯勒报告》强调英国区域研究应该古典研究与现代研究并重,因此,在古典研究之外,还应该配有历史学、人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研究,可以说《斯卡伯勒报告》试图在保持东方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开启英国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融合的新发展。^③亚非学院正是在《斯卡伯勒报告》的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下,从语言培训机构更多地转变成为教学研究机构,在区域研究领域开始成为世界一流的学术机构。^④《斯卡伯勒报告》发布后,亚非学院的教职人数从1945—1947学年的62人快速升至1951—1952学年的136人,到1959—1960年则达到155人。^⑤但是,《斯卡伯勒报告》所试图发展的多学科与现代研究并未得到充分落实,亚非学院的区域研究仍由历史学、人类学和语言研究所主导,直到1958年都还没有设立社会科学的正式教职。^⑥

^① Foreign Office,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47.

^② Ibid., p. 29.

^③ Ibid., pp. 29-31.

^④ 值得说明的是,短期的语言培训和长期的教学科研这两方面功能自亚非学院创立起就一直都存在,只是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

^⑤ Michael McWilliam, "Knowledge and Power: Reflections on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Study of Asia," p. 39.

^⑥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p. 160.

以东南亚研究为例,在《斯卡伯勒报告》发布后的十余年时间内,英国东南亚研究得到建制化发展,以历史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作为基础对东南亚国家展开深入研究。例如,亚非学院的东南亚与群岛系重新成立,开始设立固定教职和招收学生,并延续至今。其中最重要的大概莫过于该系聘请丹尼尔·霍尔(Daniel George Edward Hall)担任讲席教授,他不仅发表了东南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东南亚史》,而且训练了一批年轻的英国东南亚史学家。在他任下(1949—1959年),亚非学院不仅在已有的缅甸研究、马来研究和印尼研究得到加强,而且在泰国研究、柬埔寨研究和越南研究等领域也有新拓展,另外,还进一步增加了东南亚艺术和考古等课程。^①此外,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东南亚研究以人类学的研究路径见长,通过扎实的田野观察,艾德蒙·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和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东南亚民族志领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②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随着另一份政府报告《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于1960年起草并于1961年公开发布,英国区域研究进入第二个时期,时间大概从1961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可谓是英国区域研究的黄金时期,也是亚非学院历史上扩张最为迅速的时期。《海特报告》评估了《斯卡伯勒报告》公布以来英国区域研究的发展状况,并以美国区域研究为重要参照,特别指出前一时期英国区域研究的两个不足:一是在多学科研究方面的不足,古典研究与现代研究仍然失衡,再次建议设立整全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尤其是应该在历史学、人类学等已有学科的基础上,加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对于各个区域国别的全方位研究,具体做法包括设置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中心,以及在正式教职和研究生奖学金上更多地向社会科学学科倾斜;二是资源投入方面的不足,在大学教职数量、语言课程设置、图书馆资源、研究生奖学金和海外田野调查基金等方面仍差强人意,应有针对性地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区域研究。^③《海特报告》的分析针对性强,并且政策建议具有可操作

① Peter Carey, "Maritim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Their Development, 1945-85," *Archipel*, Vol.31, 1986, p. 22.

② Edmund R. Lea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Sarawak: A Report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a Social Economic Survey of Sarawak*, London: HMSO, Colonial Research Studies, 1950; 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London: HMSO, Colonial Research Studies, 1957.

③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1961.

性,因此很快便付诸实践,对这一时期英国区域研究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海特报告》的建议下,英国政府对于区域研究的拨款大大增加,英国大学拥有更加充足的资源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结合的区域研究。亚非学院于20世纪60年代相继成立经济学与政治学系和地理学系,已有的人类学系也将社会学纳入其中。^①在这一时期,亚非学院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数量大大增加,超越语言类教学和研究人員,成为亚非学院的主导力量。^②前文所提到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弗里德曼和康奈尔大学的乔治·斯金纳(George William Skinner)于1962年共同创立伦敦—康奈尔项目(London-Cornell Project),将伦敦经济学院、亚非学院和康奈尔大学三校资源整合,并且与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合作,大大地促进了英国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融合。

其次,为了促进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在区域院系的基础之上,亚非学院于20世纪60年代设立了五个区域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近东与中东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和远东研究中心。亚非学院的学术教职基本都双聘于区域院系和区域研究中心,也就是说,区域研究中心是为了补益而非取代已有的学科院系设置。区域研究中心聘请其领域内资深的学术权威作为主席,在中心主席的号召下,区域研究中心定期举行小型研讨会和大型会议,大量的国际知名人士也被邀请到亚非学院做演讲。另外,区域研究中心承担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区域研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亚非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了一系列的区域研究硕士项目并取得巨大成功,而更为根本的本科生培养和博士研究生培养则继续保留在区域院系中。^③例如,亚非学院的非洲研究中心于1965年成立,第二年开始招收非洲研究硕士研究生,现已发展成为非洲之外世界上最大的非洲研究机构,中心目前拥有教职人员50余人,每年举办几十场会议、讲座、研讨会等活动,搭建起诸多关于非洲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网络。

再次,英国大学不仅仅依赖于亚非学院,而且在伦敦之外新建立了一批区

① 亚非学院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合并设为一个系,本意是为了促进两个学科之间的教学和科研合作,但后来还是由于二者理论与方法的巨大分野而分道扬镳了,分设经济学系和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系。

② David Arnold and Christopher Shackle, eds., *SOAS Since the Sixties*.

③ *Ibid.*, pp. 9-10.

域研究中心,使区域研究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内实现去中心化的全面发展。以东南亚研究为例,除了亚非学院的东南亚研究中心,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和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分别于1962年和1969年设立东南亚研究中心,经过十余年发展都成为英国伦敦之外的东南亚研究重镇。以赫尔大学为例,其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社会科学化努力尤其显著,新招的东南亚研究人员大多经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专门训练,研究生教育(甚至某些本科生项目)也都强调东南亚研究与主流学科的综合培养,成功培养出了一批在英国和海外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赫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图书馆建设也堪称瞩目,赫尔大学每年拨专款用于东南亚资料馆藏建设,其图书馆当时成为伦敦之外最重要的东南亚研究资料来源。^①除此之外,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老牌强校也在东南亚研究领域有所建树,但由于其历史底蕴深厚,相比于赫尔大学和肯特大学更少地受到社会科学化的影响。以剑桥大学为例,前文所提到的利奇从伦敦经济学院加盟剑桥大学,与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J. Tambiah)、吉尔伯特·刘易斯(Gilbert Lewis)等人综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等研究路径,继续强调田野实地调研,对东南亚群岛国家的语言、文化、民族进行深入研究,并设立专项基金资助研究生进行海外田野调查,和赫尔大学一样成功培养了一大批新一代东南亚研究学者。^②在这一时期,英国成立了一批区域研究中心,除上述三大东南亚研究中心外,牛津大学和杜伦大学设立中东研究中心,剑桥大学设立南亚研究中心,伯明翰大学设立西非研究中心,利兹大学设立中国研究中心,谢菲尔德设立日本研究中心等。

最后,20世纪60年代英国区域研究的快速发展,促成了众多区域研究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区域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发展。仍以东南亚研究为例,英国东南亚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K, ASEA-SUK)于1969年建立,会员基本包括英国所有的东南亚研究学人,并定期在各大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轮流举办东南亚研究年会。英国东南亚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in South-East Asia, BISEA)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初,与英

① Peter Carey, "Maritim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Their Development, 1945-85," pp. 24-25.

② Ibid., pp. 27-28.

国东南亚研究学会不同,它是英国国家学术院在海外(新加坡)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致力于促进英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东南亚研究学者的交流。^①

回顾亚非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英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30年时间内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斯卡伯勒报告》开启了亚非学院的新篇章,《海特报告》则帮助亚非学院书写了最辉煌的一章,英国区域研究亦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对于区域研究产生前所未有的重视,两份基于深入调研并产生切实有效政策建议的政府报告,以及大学拨款委员会持续不断的定期拨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区域研究快速发展和扩张的重要条件。一方面,英国区域研究虽然更多地依靠政府支持,但却比前一时期更加强调基础学术和专深研究,更少发挥语言培训和政府智库的功能;另一方面,英国区域研究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强调社会科学对区域研究(包括现代研究)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未放弃对语言教学和古典研究的重视,也并未与欧洲更为深厚的人文传统相割裂,与美国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导下的区域研究相比,英国区域研究实际上更为多元平衡,这从亚非学院对于学科院系、区域院系和区域研究中心的多样化设置中可以看比较清楚。

另外,对于这一时期亚非学院所形成的区域研究的两种制度化形式——区域院系和区域研究中心——还值得多做一些比较和探讨,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在英国存在,而且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普遍存在。由于区域研究更多地引入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区域研究和传统学科的关系在不同的制度化安排下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常在区域院系中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因为区域研究学者将它们视为社会科学对区域研究的入侵;另一方面,区域研究中心强调其作为开展跨学科研讨和合作的平台,往往不强调自己的系或学科属性,因此对大学的传统结构威胁不大。事实证明,区域院系在后来或多或少地衰弱了,表现为区域院系所培养的人才比较难以进入学科院系,但因为区域研究需要从学科中获取理论和方法,反过来不得不大量引进学科院系的研究人员,而且学术聘任和晋升的重要

^① Victor T. King, "British Perspectives on Southeast Asia and Continental European Comparisons: The Making of a Region," in Park Seung Woo and Victor T. King, eds.,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pp. 289-293.

权力也一般都把控在学科院系手中;相反,区域研究中心更能适应大学的文化和结构,也更易于被大学所接受和取得成功,成为区域研究在大学中更为常见的制度化形式。^①

四、英国区域研究的收缩和调整

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1974年)的爆发,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涨困境,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1980年)之后撒切尔夫人执政的英国政府进一步采取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政府对大学的拨款急剧减少,人文社科领域尤甚,英国区域研究也进入寒冬期。在这十年(1976—1985年)间,英国大学区域研究的教职鲜有增加,新毕业的博士往往难以找到工作岗位,给予研究生的奖学金和田野调查基金也相当有限。更糟糕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学裁员和提前退休非常普遍,无法续聘资深教授也使得区域研究遭到沉重打击。以亚非学院的东南亚研究为例,亚非学院的格奥尔格·米尔纳(Georg B. Milner)、约翰·巴斯廷(John Bastin)、鲁思·麦克维伊(Ruth McVey)、拉塞尔·琼斯(Russell Jones)等教授纷纷提前退休,凯迪尔·安瓦尔(Khaidir Anwar)、约翰内斯·卡斯帕里斯(Johannes G. de Casparis)、默尔·里克莱夫斯(Merle Ricklefs)等东南亚研究专家也都无法得到续聘。^②在上一个黄金时期建立的两个全国性东南亚研究组织也遭遇截然不同的命运,虽然英国本土的东南亚研究学会继续运行并延续至今,但海外的英国东南亚研究所因为资金困难最后不得不停止运行。英国东南亚研究所为了改善财务状况,于1984年从新加坡迁往泰国曼谷,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1986年正式关停。^③

面对严峻形势,亚非学院于1981—1982年设立专门工作组,由主管教务的马尔科姆·亚普(Malcolm Yapp)教授主持撰写报告,研究亚非学院在艰难

^① David Szanton,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6-7.

^② Peter Carey, "Maritime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urvey of Their Development, 1945-85," p. 31.

^③ Victor T. King, "British Perspectives on Southeast Asia and Continental European Comparisons: The Making of a Region," pp. 293-294.

时势下的收缩战略和应对措施,《亚普报告》成为《斯卡伯勒报告》和《海特报告》之后影响亚非学院发展的第三份重要报告。该报告于1982年完成,论述亚非学院在国家和大学的双重责任下如何进行区域与学科布局及其相应的教职调整。国家责任是指亚非学院长期以来给英国政府官员提供语言培训和提供智力支持,大学责任则是指亚非学院的各种院系和研究中心维持教学和研究的必要条件。前者是继续获得大学拨款的基础,但由于国家财政紧张,因此后者变得更为突出,亚非学院需要努力自力更生,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学科院系和现代研究,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生从而增加学校的办学经费,而把更少的资源放在区域院系和古典研究。^① 具体而言,除了保留一些重要的关乎国家责任和专深研究的语言类教职,^②相当部分无法招收可观学生数量的语言类教职都被削减了,这与《斯卡伯勒报告》所强调的教职设置应独立于招生需求的政策可谓截然相反。例如,亚非学院非洲系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30名学术教职,到1985年仅剩9名。另外,非洲其实拥有千余种语言,如今亚非学院教授的非洲语言却只有五六种。^③ 《亚普报告》的这一核心建议实质上进一步扩大了《海特报告》的影响,语言类教职和社会科学类教职的数量对比可以很好地反映这一此消彼长:从1967—1987年,语言类教职人数从142降到82(下降44%),社会科学类教职人数却从53升至59(上升11%)。^④ 另外,20世纪80年代亚非学院政治学系将国际研究纳入其中,并于1991年和1992年分别新设立发展研究系和金融与管理系,都可谓是亚非学院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现代研究从而扩大招生规模的表现。相应地,也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段开始,亚非学院的招生规模,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开始呈现大规模增长,学生学费也越来越为成为学校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⑤ 亚非学院在

^①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Longer-term Development*, July 31, 1982, p. 2.

^② 例如,古汉语、梵文和中东的一些古代语言,虽然招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非常少,但却是从事东方研究所必需的基础,因此成为少数继续保留教职的稀有语种。

^③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p. 226.

^④ David Arnold and Christopher Shackleton, eds., *SOAS Since the Sixties*, p. 117.

^⑤ 需要说明的是,这也与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有关系,即英国1988年所颁布的教育改革法令(*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鼓励学校间的相互竞争。亚非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也必须顺应英国高等教育体系改革所带来的影响。笔者的看法受到石玉凝博士观点的启发。

1990年前后拥有本科生和研究生总共1000人左右,到了2000年前后这一数目超过3000人,进入2010年后则基本维持在5000人以上。^①

亚非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发展,并经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艰难时期,可谓盛极而衰。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复苏和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带来了新希望,但由于时过境迁,英国的国际地位、战略利益、国家资源和公众舆论都使得英国区域研究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虽然一系列针对英国区域研究严峻状况的政府报告相继出台,包括1986年的《帕克报告》(Parker Report)、1989年的《戈尔德报告》(Gold Report)和1993年的《霍德-威廉姆斯报告》(Hodder-Williams Report),但这些报告再也无法如《斯卡伯勒报告》和《海特报告》一样产生实质性的政策影响力,大概只能表达关切但却无力回天,英国区域研究也就进入了持续衰退的阶段,至今未能扭转颓势。^②例如,英国曾经辉煌的三大东南亚研究中心只剩下亚非学院一家,肯特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于1991年关停,赫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也于2002—2005年逐步停止运行,大部分研究人员陆续离开,其余则编入利兹大学的东亚研究系之中。^③英国东南亚研究的兴衰表明,区域研究需要相当的人力和财力投入,高度依赖政府建立研究机构的政策举措和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由于时过境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东南亚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使得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而且英国各界精英也无法重新聚集对于东南亚的关注,这决定英国东南亚研究的持续衰退恐怕是难以扭转的。

虽然英国对于区域研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大不如前,但是亚非学院通过扩大招生规模,从而实现更大的财政自主性,因此,亚非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

① David Arnold and Christopher Shackle, eds., *SOAS Since the Sixties*, pp. 4-5;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p. 282.

② Peter Parker, *Speaking for the Future: A Review of the Requirements of Diplomacy and Commerce for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and Area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1986; Peter Gold, *Post-Parker: The State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Languages Four Years On*, Sheffield: National Council for Modern Languages in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 1989; Richard Hodder-William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Report to the Area Studies Monitoring Group*, Bristol: University of Bristol, 1993.

③ 参见利兹大学东亚研究系介绍: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Studies at Leeds," <https://ahc.leeds.ac.uk/east-asian-studies/doc/east-asian-studies-leeds-history>, 2023-01-13.

并非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形成了具有亚非学院特色的办学体系。首先是亚非学院的本科生培养,较好实现了“区域+学科”的教学平衡。亚非学院的区域类本科学位包括阿拉伯文、中文、日文、韩文、东亚研究和语言与文化(中东、非洲、南亚和东南亚)这六个方向,学科类本科学位则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人类学、法学、发展学、管理学、会计与金融、语言学、音乐和艺术等诸多领域。亚非学院最具特色的是其在本科培养中设立了大量“区域+学科”的混合学位,例如,“政治学与东亚研究”“经济学与中文”“日文与发展学”“阿拉伯文与国际关系”等。^① 亚非学院的本科生可以自主选择将区域置于第一专业,也可以将学科置于第一专业,但实际上二者的比重是相对平衡的,这与美国或中国所普遍采用的“主修(major)+辅修(minor)”的制度来结合学科与区域的本科培养有所不同。亚非学院的本科生在三年时间内总共需要修够360个学分,^②其中,第一专业的学分总数不得少于150个(并通过所有的必修课程),第二专业的学分总数不得少于120个。可以说,亚非学院的本科生在学位和专业上具有相当大的选择空间,毕业后在区域与学科的结合方面往往具有独特优势。

其次是亚非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也都分别有区域类学位和学科类学位,前者包括中国研究、日本与韩国研究、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近东与中东研究、非洲研究这六个方向,后者同样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社会学与人类学、法学、发展学、金融与管理学、语言学、宗教与哲学、音乐和艺术等诸多领域。^③ 如前所述,区域类硕士学位项目大多由亚非学院的区域研究中心负责,而区域类的本科和博士学位项目则仍由区域院系负责。例如,亚非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设有东南亚及太平洋亚洲研究硕士项目,而东南亚研究的本科和博士项目则由东南亚系负责培养,其语言教学扎实,基本实现东南亚主要语种全覆盖,主要包括缅甸语、泰语、越南语、柬埔寨语、印尼语、马来语和菲律宾语,并特别提供缅甸语和印尼语的远程学

① 参见亚非学院本科生课程:SOAS Undergraduate Courses, <https://www.soas.ac.uk/study/undergraduate/undergraduate-courses>, 2023-01-13。

② 英国一学期的课程一般是15学分,横跨两个学期的课程一般是30学分,这意味着本科生平均每学期上4门左右课程,3年时间内可以修够毕业所需的学分。

③ 参见亚非学院研究生课程:SOAS Postgraduate Courses, <https://www.soas.ac.uk/study/postgraduate/postgraduate-courses>, 2023-01-13。

习。应该说,区域院系和区域研究中心对于亚非学院的学生培养产生不同的贡献和影响,前者强调区域研究的语言基础,并与学科院系形成密切合作,后者强调区域研究的跨学科属性,提供多学科和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总的来说,亚非学院在区域与学科的结合中形成了本硕博层次化的学生培养,区域与学科门类齐全,多学科和跨学科合作研究活跃,在英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研究教学方面具有鲜明特色。

回顾亚非学院的发展史,不同的人可能会对英国区域研究发展至今产生不同评判。有学者说,虽然大英帝国不复存在,但亚非学院找到了历久弥新的学术使命,致力于推进对亚洲、非洲与中东的认识和理解。有学者则悲观地认为,亚非学院大量丢失其古典学和东方学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自《海特报告》之后就一直有此趋势),这些珍贵奢侈但却并无太大实用的学问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① 有学者会乐观地说,不管是在研究还是在教学,亚非学院在区域和学科、古典研究和现代研究之间确定了新的平衡,也更加能够回应国家和社会关切。^② 悲观抑或乐观,当然取决于不同人的不同品味、位置和态度。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亚非学院的校训是“知识就是力量”,诚如亚非学院前校长(1989—1997年)迈克尔·麦克威廉(Michael McWilliam)所言,除非亚非学院能够获得稳定的办学资金,它才能真正有效地运用知识的力量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③ 这就意味着,区域研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达成其目标,亚非学院发展史表明,区域研究的兴衰是与国际格局和国家国势影响下的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相连的。当然,区域研究并不能单靠国家而完成其使命,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包括商界和学界精英甚至普通民众)都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毕竟区域研究本质上是一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的组织和群体都可以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能够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中形成合力,应是促进区域研究发展的良性路径。无论如何,亚非学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变化,是冷战后新形势下所进行的新调整和新发展,应有其合理之处。

① Michael McWilliam, “Review of Language Teaching,” SOAS R 390/1, April 21, 1992.

② 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p. 1.

③ Michael McWilliam, “Knowledge and Power: Reflections on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Study of Asia,” p. 43.

结 语

本文通过对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历史考察,梳理英国区域研究发展史,发现其先后经历创生、发展、扩张、收缩和调整几个不同时期,并且与美国和欧陆国家的横向对比中发现了某些共性和诸多特性。笔者对于英国区域研究和亚非学院发展史的梳理肯定是挂一漏万的,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在于,笔者更为关注亚非学院的创生史和发展史,对于其收缩、衰退和调整着墨相对较少,这是因为笔者最重要的问题意识是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蒸蒸日上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区域国别学,对笔者来说前者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通过梳理英国区域研究和亚非学院的发展史,可以对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产生如下三点重要启示。

首先,回顾英国区域研究的发展史,笔者感受到其明显受到国际格局和国家国势影响,亚非学院自创生之始就与英国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相连。然而,区域研究亦不能单靠国家而完成其使命,或者说语言培训和智库功能绝非亚非学院的全部。对于美国地区研究创生史的研究表明,地区研究虽然在美苏冷战背景下展开,但却并非完全是政治宰制学术的逻辑;“冷战地区研究”断言地区研究被冷战政治和国家政策所塑造、驱动和制约,忽视和贬低了地区研究发展的智识源动力,实际上地区研究是美国社会科学拓展知识对象、构建更整全学术体系的结果。^① 同样,亚非学院的创生并不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而且依赖诸多自下而上的协商和协作,政府部门、大学机构和学术组织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中形成合力,虽然推进速度较为缓慢,但却符合英国人渐进主义、稳中求进的行事风格。同时还应意识到,英国区域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毫无疑问受到美国区域研究的强烈影响。虽然欧洲东方研究和美国区域研究在本体论上都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当然前者更甚),但在认识论上二者有明显分野,东方研究更强调人文传统,遵循整体主义和阐释主义的研究路径,而区域研究更偏向科学传统,强调还原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

^① 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

方法。^① 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构建区域国别学反映了中国需要加深对外部世界理解的迫切需求,理应为中国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但同时也应该考虑研究路径的权衡取舍及其相应的学理贡献,特别是注重基础学术和专深研究的价值。在构建区域国别学的学术“规划”中,应该有更多自觉而深入的关于科学与人文、学术与政策、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效用,甚至是学术自主与行政体制层面的思考和反思。笔者相信,只有学理基础扎实,区域国别学才能行稳致远,中国高校中的诸多智库才能避免“有库无智”的尴尬局面,区域国别学也才有可能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其次,一国区域研究体系的总体格局和学科特征也与该国高等教育和财政体制的安排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往往形成于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与美国相比,英国区域研究从一开始就较为集中于少数高校,欧陆国家亦是如此,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若干原因。其一,国土和人口规模是影响一国区域研究机构分布的重要因素,毕竟欧洲国家往往只有美国一两个州的面积或中国一两个省的人口;其二,区域研究相对于其他人文社科研究而言往往成本更大、条件更高,不得不高度依赖大学之外的组织机构的政策或资金支持,在这方面美国高校独具优势。美国私立教育发达,校友捐赠是私立大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公立大学主要依靠所在州政府的财政拨款,大型基金会资助则是美国大学的另一重要资金来源。相比之下,英国政府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向各高校拨款,大学基金的分配是按照国家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求决定的,通过竞争申报的方式分配经费,促使各校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另外,法国和德国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亦主要是政府拨款,德国大学甚至对就读第一学业的大学生免收学费,其高等教育经费基本完全由国家承担。因此,由于规模、资金和历史等方面原因,相比于美国,欧洲国家的区域研究机构更多地依赖国家财政拨款,亦更多地集中于少数高校。如今,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任何一所国立大学,区域研究星罗棋布地分散在诸多顶尖大学中,前文所提及的国立东方

^① Richard E. Lee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Overcoming the Two Cultures: Science vs. the Humanities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Biray Kolluoglu-Kirli, "From Orientalism to Area Studies," *CR: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Vol.3, No.3. 2003, pp. 93-111.

语言文明学院是法国区域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与亚非学院在英国的地位相当,西方区域研究体系的总体格局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巨大改变。

亚非学院作为英国实力最为雄厚的区域研究机构,不仅具有区域院系,语言基础扎实,与学科院系合作紧密,而且具有区域研究中心,提供多学科和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虽然亚非学院从20世纪60年代起强调社会科学对区域研究(包括现代研究)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未放弃对语言教学和古典研究的重视,也并未与欧洲更为深厚的人文传统相割裂。与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导的美国区域研究相比,英国区域研究显得更为多元平衡。不管是教学还是研究,亚非学院都在扎实的语言基础之上强调区域研究与人文社科诸学科结合,也许是中国构建区域国别学可供参照的建制模式之一,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种方案可供考虑。^①第一种是在中国的区域院系或者区域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国别学。如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设有东北亚学院,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暨南大学等均有东南亚研究院/所,这些大学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便利条件在区域研究领域各有分工和比较优势,但现有研究力量往往偏重历史和国际关系,在东南亚语言教学和跨学科合作这两方面仍显不足,因此,应该努力打通大学内院系间合作,加强这些区域院系与外文学院的教学合作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院系的研究合作,努力补上短板。第二种是在中国的语言院校/系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国别学。如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语言院校在区域国别语言教学和人文研究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的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也颇具特色,但与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结合则相对较弱,“区域+学科”的培养和研究模式在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第三种是在中国最好的综合大学设立区域国别学的实体机构,以“全世界覆盖”为目标,通过整合各院系和研究中心的资源进行协同合作与创新,成为“区域+学科”的综合性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国能拥有如此丰富资源的综合大学恐怕并不多,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前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相关机构也许可以在未来有新发展。如前所述,英美经验表明,与区域研究中心更能适应综合大学的文化

^① Kankan Xie, “Experienc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China: A Reverse Culture Shock,”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52, No.2, 2021, pp. 170-187.

与结构相比,区域院系在后续发展中或多或少地衰弱了,因为语言、区域和学科之间的自发平衡并不容易产生,中国顶尖综合大学里的这一类区域国别学实体机构能否走出与众不同的成功之路,值得进一步观察。

再次,亚非学院在本科培养中“区域+学科”的混合学位,将二者置于相对平衡的位置,可供中国院校拟定区域国别学的本科生培养方案时参考。与美国普遍采用的“学科主修+区域辅修”或者中国语言院校/系所普遍采用的“语言+”制度有所不同,亚非学院“区域+学科”的混合学位给予学生相当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学生可以选择将区域置于第一专业,也可以将学科置于第一专业,两个专业的比重相对平衡,分别修够所需学分即可,本科生毕业后在研究生学习或者实际工作中拥有独特的优势。另外,亚非学院的硕士生项目特色鲜明,区域研究硕士生项目主要由区域研究中心负责,语言要求相对较低,强调跨学科研究,而博士生则仍由区域院系负责培养,与本科生一样要求扎实的语言和学科基础。中国大学目前虽然在硕士研究生学位中有学术型和专业型之分,但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往往区别并不大,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应更明确地区分研究型人才和实务型人才,也许可以考虑设计特色更为鲜明、更具有针对性的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培养方案。

2021年12月,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将区域国别学纳入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学位。区域国别学的构建,对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在语言、理论、历史、方法和教材等方面提出更高的学理要求,而且在教职隊伍、馆藏资源、期刊建设、学生田调等方面需要有更好的制度保障。尽管历史和现实中的西方区域研究有各种问题、困境和缺陷,但它们仍有重要的参照价值。所谓鉴往知来,本文通过对英国区域研究和亚非学院的历史考察,并且在与美国和欧陆国家的横向对比中,发现英国区域研究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可以对中国构建区域国别学产生若干有益启示,笔者期待看到未来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新气象。